

授称：“中国自明代中期以来开始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依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中国商品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而且当时许多日用品生产技术为中国所专有，占据了有利的市场垄断地位。”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他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认为，1400年至1800年这四百年间，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体系格局。特别是在新大陆发现以后，葡萄牙人在南美洲开采银矿，其主要用途就是为了买到中国货。完全可以说，当年的中国因自身的智造能力而富国。

留给未来的启示

在20世纪中后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中学历史课堂上，老师会对学生说，郑和下西洋的起止时间大约在1405年至1433年，此前，洪武皇帝朱元璋曾敕令“寸板不许下海”；即使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对民间也没有解除海禁；郑和下西洋以后，海禁执行得更严厉。也正因为郑和下西洋之事中断，才使得西方在航海能力上后来居上、超越了中国。

当然，进入21世纪以来，诸如加文·孟席斯等人持有新观点，认为是郑和船队首先到达了美洲、发现了美洲。但无论是谁先发现了美洲，总之中国明清两代的海禁，使得闭关自守的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也因此不能较早踏入近代化的门槛。

如今值得细查的一个问题是——朝廷执行海禁的同时，中国大地上各种与海外的贸易真就断绝了吗？如果中外贸易并没有禁绝，那么，明清以降，中国逐渐落后的根本原因又在哪里呢？

海权战略学者、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倪乐雄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关键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一支真正意义上的持续发展的海军舰队。郑和下西洋固然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伟业，但其兴盛的直接动因是文化传播和政治性的炫耀，是礼制朝贡传统和中央集权在海上的一种军事兑现。”

但倪乐雄又点明——明末的郑氏海军，实际上就已经与传统的朝廷水师有了区别。因为有了明朝中后期海上贸易的勃兴，使得郑氏水师的性质变了——变为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郑芝龙到郑成功，父子两代经营，使得郑氏水师从海盜船、武装商船发展到成规模成体系的海军。“明代出现的这样舰队，



从福建泉州大坪山可看到郑成功雕像和泉州城区的现代建筑。

某种程度上与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已经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了。”倪乐雄说。

在倪乐雄看来，特别令人遗憾的是，由海外贸易催生出的郑氏水师，能在台海打败侵略者荷兰人，却只是在明末清初昙花一现，未能长期经营下去，其模式也未能被统治者所重视、利用。甚至郑氏海军的许多生存模式是与帝制时代的中国统治模式相抵牾的。

从南海沉船的被发现，则能看出，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有农耕文明，哪怕在古代也已经孕育出海上商业文明之花。哪怕一度这文明之花没有直接牵引中国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可其留下的遗产，是体现出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协和万邦的和合智慧的，是明证了中国古人倡导“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如今，新时代的中国携手世界，旨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南海古沉船重回世人视线，也给未来留下了相当多的启示。■